

书里书外

“科学传教士”眼中的上帝

■尹传红

【随着科学的进步,上帝可“做”的事情似乎越来越多。不过,宇宙很广大,需要他、她或它的地方很多。然而,很明显,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填补空白的上帝”。】

美国著名天文学家 and 科普作家卡尔·萨根(1934~1996)留下了《宇宙》《暗淡蓝点》《魔鬼出没的世界》等多部科普名著。晚年的他最为关切的是,尽管科学已然创造了人们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诸多奇迹,但迷信和伪科学依旧与此相伴并且大有市场。它们扰乱了人们的意识和思想,使人们感到惶惑、迷惘。尽管萨根享有“代表现代科学的偶像”“独一无二的‘科学传教士’”等美誉,但也不必讳言,他生前曾被有些人看成是典型的科学主义者,他的一些科学观点也常被指责为“科学至上主义”,甚至认为他很“霸道”,蔑视除科学以外所有的文化和价值。我觉得,这当中或有误解。其实,萨根既是一位理性科学思维的忠实捍卫者,又是一位饱含激情、视野开阔的幻想家和探索者。他持有这样一种理念:科

学远不是十全十美的获得知识的工具,科学仅仅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工具;而且,科学未探明的事情有很多,许多秘密仍待揭示……

鲜为人知的是,萨根曾经直面过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甚至认真探究过上帝。《卡尔·萨根的上帝的上帝——上帝探究之个人见解》(张江城译,海南出版社)一书集中反映了他的思考和认识,这是萨根于1985年在著名的苏格兰吉福德讲座上演讲内容的收录。在这次讲座中,萨根触及的是一个深刻且难以说清楚的问题——上帝是否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证明上帝存在/不存在的方法。

据此书编者,萨根的夫人安·德鲁扬回忆,作为科学家的萨根不能接受分而治之的生活:一面在实验室信奉一套假定,一面为安息日保留另一套与之矛盾的假定。他对上帝的观念太过认真,所以必须用最严格的标准加以考究。他不明白,《圣经》中描述的永恒而全知的上帝怎么会心安理得地对创世持有如此多的根本性误解?如果上帝是全能的,那为什么他不能让全世界没有痛苦?人类作为新来者不过刚刚开始研究宇宙,为什么《圣经》中的上帝对自然的知识远不如我们丰富?

萨根也不能容忍《圣经》中描述地球仅仅为6000岁的扁平大地,他觉得人类与其他生物是分别创造出来的说法尤其可悲。无数显而易见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人类与所有生物的确存在相关性。在萨根看来,达尔文关于生命是通过自然选择、历经数不清的年代进化而来的见地,不仅比《创世记》更为科学,而且提供了一种更深刻也更令人满意的精神体验。

在一场讲座之后的问答环节,针对听众提问“科学会不会有一天拿出证据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萨根说道: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帝

的含义。“上帝”这个词可以涵盖大量互相排斥的概念。我相信在很多情况下,各种含义之间的差别被有意模糊化了。这样做的用意是,当别人谈论的不是他们的上帝时,没有人会受到冒犯……

萨根认为,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有智的崇拜”。我们不能把求索真理的路途中迈出的任何一步神圣化,神圣的只有求索过程本身。他提示说,随着科学的进步,上帝可“做”的事情似乎越来越少。不过,宇宙很广大,需要他、她或它的地方很多。然而,很明显,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填补空白的上帝”。也就是说,凡是我們目前不能解释的事物,都可归因于上帝。

后来,我们能解释了,这种事物也就不再是上帝管辖的范围。于是,神学家就会放弃这个事物,将它归入科学的职责。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如果真的存在西方宗教中的上帝,那么,事实上是上帝在不断地迁移;他启动了宇宙,建立了自然法则,然后就引退了,或者去了其他地方。

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中写道:“热爱真理的一个永远不会错的标志就是,不能超越证据所能保证的可信度去考虑问题,因为证据是事物存在的基础。”上帝的存在能否证明?今天的哲学家已经取得了一个共识,即上帝的存在是无法证明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上帝不存在,而仅仅意味着上帝的存在是无法加以理性证明的。

阿依达

■洪烛

从来就没有最美的女人
最美的女人在月亮上
月亮上的女人用她的影子
和我谈一场精神恋爱
阿依达,你离我很近,又很远
请望着我,笑一下!
阿依达,我不敢说你是最美的女人
却实在想不出:还有谁比你更美?
在这个无人称王的时代,你照样
如期诞生了,成为孤单的王后
所有人(包括我)都只能远远地
爱着你,生怕迈进一步
就会失去……失去这千载难逢的
最美的女人,最美的影子

这张脸,用花朵来比喻太俗!
即使玫瑰、水仙、丁香之类的总和
也比不上阿依达的一张脸
看到阿依达的微笑,我想
这个世界哪怕没有花朵
也不显得荒凉
与阿依达相比,鲜花的美
是那么的傻——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选自《汉英双语版中国诗选2014》,北塔主编,线装书局)



图片来源:昵图网

海明威致父母的信

海明威参加一战并受伤是文学史上著名的故事。更加著名的《战地春梦》即源自这段经历。海明威受伤后给家人写了封信,这些信当得第一手传记资料,读来饶有趣味。因为这位伤兵充满乐观主义情绪,这情绪感染着读者。海明威“硬汉”的形象由此树立。本文是其中一封,写于1918年7月21日米兰。

——编者

我想布卢米已经给你们写信讲了我在受伤的事情。所以,我就别说的再说了。我希望电报没让你们太着急,贝茨上尉觉得还是由我先告诉你们为好,省得报纸先说。你们知道,我是意大利战场第一个受伤的美国人,我想报纸会就此说点什么。

这里的医院真是桃子一样甜美。18个美国护士照顾4个病人。一切都好,我很舒服;米兰最好的外

科大夫之一在照料我的伤口。X光显示还有两个弹片在我体内,一颗子弹在我膝盖里。大夫很明智,经会诊,拟等我右膝的伤口愈合后再做手术。子弹弹时被肉包住,他可以动刀利索,直进膝盖下边。让伤口先完全愈合可以避免感染和膝盖僵硬。爸,你不觉得这样做很明智吗?同时他也会从我右脚取掉一颗子弹。大夫也许一个礼拜后动手术,那时伤口愈合干净了,不会有感染。在伤病员收容站我就打了两针抗破伤风的针剂。其他子弹和弹片都被取出来了,左腿上的伤口愈合得很好。我的手指都清理完了,绷带也去掉了。由于没有损着骨头,我的伤不会留下后遗症,即便是我的膝盖上的伤。左右两膝盖子弹都没有让我膝盖骨折。左膝盖一个弹片有玩具车轱辘那么大小,不过已经取出;此膝盖目前移动自如,伤口也愈合。右膝盖子弹从左侧进了膝盖骨下边,丝毫没伤

着骨头。你们收到此信时,大夫已然做完手术,伤口届时就愈合了。八月下旬我希望能山里接着开车。我有几张皮亚韦河漂亮的照片,还有其他有趣的照片。也有很多奇妙的纪念品。我亲历了大战役,缴获有奥地利式卡宾枪和子弹,有德国和奥地利奖章,有军官用自动手枪,有德国盔甲,约有一打刺刀,有照明弹手枪,还有刀具和你们能想到的所有东西。纪念品数量的唯一限制是我拿不了这许多。死了的和被俘的奥地利人太多,战地黑压压一片全是他们。这是一场大胜仗,它向世人显示了意大利人多骁勇善战。

回家过圣诞节时我会告诉你们一切的。这里现在天气很热。我能定期收到你们的信。问候大家,爱你们所有的人。

(摘自卡洛·贝克的《海明威书信选集》,潘小松译)

碟碟不休

【从“抄袭”走向了“超越”,同样也是大师。】

从VCD时代我就开始收藏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电影,最先淘到的是他早年的成名作《罗生门》和晚年的代表作《乱》,看完之后感觉没有传说得那么好,使我对自己的欣赏水平和评论界的说法都产生了怀疑。

DVD时代,我又陆续续续收了一些黑泽明的电影,可收得多看得少,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完他在1961年拍摄的《用心棒》(又译为《保镖》或《大镖客》),我才对他刮目相看,确立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大师地位。此后这部电影成了我的常备剧目,先后收过三个不同的版本,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看看。

黑泽明曾说:“长久以来,我一直希望拍出一部真正有趣的电影,于是就有了《用心棒》。影片的故事生动有趣,但让我惊讶的是,居然没有人设想过这样的故事。”电影的故事简单至极,讲的是三船敏郎扮演的一名剑术高超的流浪武士来到一个小镇,发现小镇被两股邪恶势力控制,他从中作梗,促使双方火拼,使小镇又恢复了平静。大师不是故作高深,是有能力把简单的故事拍得妙趣横生,而拍摄手法又可谓可圈可点。

虽然在提及黑泽明的代表作时评论界鲜有人会提到《用心棒》,但这部电影既是他赚钱最多的电影,也是他制作最精细的一部,连我这个外行也能感觉到这部电影的摄影非常出色。当有人问我日本导演北野武“什么样的电影才是伟大的电影”时,他说是黑泽明的电影,“我发觉黑泽明影片令人惊奇之处在于画面的精确,构图完美。你随意从每秒二十四格中拿出一格来,它就是一幅优美的画面。我认为这就是电影的理想定义:一连串完美的画面。而且黑泽明是唯一有此成就的导演”。

意大利导演莱昂内当年看完《用心棒》后非常喜欢,张罗着翻拍成了“意大利西部片”《荒野大镖客》,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在许多国家成了票房冠军。可影片的出品方却不愿意支付一万美元的版权费,结果双方对簿公堂,最终把《荒野大镖客》在日本的票房收入赔给了黑泽明。

当有人指责莱昂内抄袭时,他却矢口否认,只承认《荒野大镖客》参考了《用心棒》的结构。为了避免重复,他在开拍前仔细核对过《用心棒》的台词,认为自己影片的成功不在于是一部黑泽明电影的翻版。莱昂内还

音容犹在 业绩长存

——追忆本报前副总编王友恭

■刘茂胜

【他敢于仗义执言,带领报社同仁旗帜鲜明地反对歪理邪说,为净化舆论生态环境作出积极贡献。美国《科学》杂志为此曾派记者专门来报社采访。】

斗转星移,寒暑易节。

本报前副总编王友恭去年夏日里驾鹤西去,当时就立意写篇悼念文章,但因故迟迟未动笔。思念之情和写作的冲动,半年来常常是才下心头,又上心头。

2014年6月26日,友恭的追悼会在北京北郊一个医院里举行。

在位于胡同中的这家医院不大的灵堂里,友恭的遗体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静卧鲜花丛中,仿佛卸下征鞍的将帅,得以享受片刻的安闲。清瘦的遗容深藏着久病的痛苦,却流露出安详,羸弱的身躯,蕴含着一生的疲惫却彰显着坚强。

一个在《人民日报》当过记者,又在本报担任要职的媒体人,同事、熟人和朋友不算少,但遵照他的遗嘱,不发讣告、不写悼文、不组织单位吊唁,对人生的最后时刻的安排,凸显了逝者谦虚谨慎的一贯作风,也是友恭同志一生淡泊名利的缩影。

告别仪式简朴却不失尊严,短暂而给人们留下永久的礼赞。没有摩肩接踵的人流,只有至爱亲朋诀别的啜泣和压抑着的翻江倒海般的心潮涌动。友恭生前希望自己即便在与世界诀别的时刻,也像他的《岁月留痕》那样,给爱他的人镌刻出完美的记忆。友恭做到了。

友恭1964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时名为《科学报》的本报工作,1978年为了加强科技报道,被调到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教科文工作部,一干就是十几年。

1978年夏,他写的评论受到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表扬。1978年底,他组织专家、学者撰写的内参文章,在国内首次敲响了也有能源危机的警钟。1979年他和同事共同负责的讨论农业的专栏,是奏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解放大讨论的前奏曲。

科学的春天乍暖还寒。为了推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写的文章和参与报道激发的争论,引起党中央总书记过问。这是他工作成效最显著的一个时期。

他深感党员记者的社会责任,这期间他连续采访撰写了二三十篇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通讯和评论,写作难度和政治风险都很大。1983年后,他的两篇一万多字的文章,被报社破例安排整版刊发,分别获奖和被一些地方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

通常有的记者为写“独家新闻”会将新闻源屏蔽起来。友恭与人为善,身为《人民日报》记者却平易近人,时常注意关照同行。

友恭不惮艰辛,业绩不凡,先后获得包括中国新闻奖在内的各种新闻奖项三四十个。其中有多篇被收入新闻作品选。他还参与策划或主编了《邓小平与中国科技》(请历史记住他们)——中国科学家与“两弹一星”等十多本受读者欢迎的书。

1991年4月,中国科学院把他调回《中国科学报》,担任副总编辑。当时面临揭露“水变油”等反对伪科学的关注社会的热点新闻,友恭不负众望,为了维护科学的尊严,他敢于仗义执言,带领报社同仁旗帜鲜明地反对歪理邪说,为净化舆论生态环境作出积极贡献。美国《科学》杂志为此曾派记者专门来报社采访。

在中国科学报社期间,他被选为第五届中国科协委员,获得“有突出贡献的科普作家”证书。1998年被选为中国科技馆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工作部主任,还担任学会刊物《科学新闻·学术专刊》主编。

不管是在党报还是在科技专业媒体,友恭都坚持真理,忘我工作,爱憎分明,并嫉恶如仇,他勇敢而又勤勉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受到读者和同行的赞誉。

友恭走了,带着身受沉疴之苦的遗憾,带着对挚爱亲朋的眷恋……友恭没有走,他的热爱科技、宣传科技的音容犹在,为人民鼓而呼的业绩长存!

争鸣

校歌歌词与纪念碑碑铭是“一稿两用”吗

——与隋淑光先生商榷

■孟凡茂

【创作校歌和起草碑文是西南联大交给的任务,完成后均须经联大认定,因而,碑文引用歌词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1月2日《中国科学报》刊登的《<西南联大校歌>之作者辨析》(作者隋淑光,以下简称隋文)称只有承人碑铭和校歌词是“一稿两用”,也就是承人冯友兰是校歌词作者,才能消除作者的三个不解。对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创作校歌词和纪念碑文的经过,并讨论一下歌词与碑铭的关系。

一、西南联大校歌的制定和纪念碑的设置

1.关于制定校歌

1938年10月6日西南联大成立了以冯友兰为主席的“校歌校训委员会”,委员有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10月30日校歌校训委员会开会,罗庸提交了自已创作校歌词。朱自清在日记中记下,“通过罗的词,但未通过曲”。之后,冯友兰请沈有鼎为罗词谱曲。11月24日委员会在冯宅开会,讨论校词和校歌,会上决定把校歌词《满江红》和沈有鼎所制曲谱呈报联大常委会。此后,冯友兰创作了白话体诗“西山苍苍”,

朱自清建议让自己的学生张清常谱曲,并寄去了两份歌词。张清常只给《满江红》谱了曲,并在曲谱上写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罗庸中先生词,张清常谱”。1939年6月校歌进入评审阶段,校歌委员会对《满江红》作了修订,又请马约翰为冯友兰所作“西山苍苍”谱曲,并印制了试唱唱片。此时已有两首歌词和三份曲谱,分别是沈有鼎谱曲的《满江红》、张清常谱曲的《满江红》和马约翰谱曲的“西山苍苍”。6月30日,校歌委员会开会决定把张清常谱曲的《满江红》呈报联大常委会。7月11日,西南联大常委会开会定《满江红》为校歌。

2.关于设立纪念碑

1946年3月2日晚,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宴请冯友兰、罗庸、唐兰、刘崇铨、朱自清等10名教授,商议建立联大纪念碑事。《梅贻琦日记》和《朱自清日记》均记下此事。《朱自清日记》特别说,“主客为罗、唐、刘三人,他们都是纪念碑之设计者”。5月4日举行了纪念碑揭幕式。关于此事,1968年冯友兰曾回忆说:“我建议立一个纪念碑。大家都赞成。梅贻琦对我说,‘立碑的事就由你包了。’我自家作碑文,看石头,找刻工,请闻一多写碑头上的篆字,请国文系主任罗庸写碑文……于纪念碑揭幕

的会上,把碑文当众念了一遍。(这些事都是由我建议,常委会通过。)”虽然以上回忆与朱自清的日记有些不符,但可以认为冯友兰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应该说,纪念碑的设立是体现西南联大诸君通力合作精神的华彩一章,参与者一定合作愉快,才有举世称誉的“三绝碑”。

创作校歌和起草碑文是西南联大交给的任务,完成后均须经联大认定,因而,碑文引用歌词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既然隋文提出疑问,我们不妨讨论一下。

二、关于隋文的三个不解之处

不解之一,冯友兰用校歌词而不提罗庸会遭人非议吗?

冯友兰、罗庸一同参加了设立纪念碑的工作,冯友兰负责起草碑文,罗庸准备把碑文书写到纪念碑上。大家都在为联大工作,同事之间,冯友兰若引用校歌,只须同罗庸打一声招呼。另外,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一句,指出碑铭的出处,也就不存在涉嫌抄袭问题。如此谁还会非议呢?

不解之二,为何要“爰就歌辞”作为碑铭?

隋文谈到李白到黄鹤楼没有题诗,那完全是诗人个人的心绪和情感问题。而冯友兰为纪念碑写碑文是西南联大交给的任务,要写的也是西南

对不起,你『抄袭』了

■韩连庆

说,《用心棒》不能说是一部“原创”经典,其实黑泽明模仿的是哈米特的侦探小说《血色收获》。

美国作家达希尔·哈米特曾在侦探事务所供职六年,他在1929年发表的处女作《血色收获》为侦探小说增加了现实主义,开创了所谓“硬汉侦探小说”,试图与所谓的“纯文学”比肩。这一流派的侦探小说强调的不是探索,而是塑造人物,所以

对于像我这种看惯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的人来说,一直无法适应阅读这类小说。《血色收获》讲的是一名侦探受雇来到一个叫“毒镇”的小城市,发现这个城市被几股恶势力控制,他从中作梗,导致黑帮之间自相残杀。用小说中无名侦探的话来说,“毒镇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这是我喜欢的工作,并且一定要做”。

从结构和情节上来看,《用心棒》与《血色收获》确有相似之处。《用心棒》中,三船敏郎扮演的流浪武士也没有名字。当别人请教他的大名时,他看到后院的墙外是一片桑田,随口说道,“我姓桑田,名叫桑田三十郎,尽管快四十了。”当他了解了小镇的情况后,觉得这地方不错,别人不解,他解释说,“这地方杀人能赚钱,而且杀的都是败类。”

莱昂内尽管没有抄袭《用心棒》的台词,可他抄袭了很多细节,比如《用心棒》的开场有一个狗吠着人手的镜头,《荒野大镖客》也如数照搬。不过他说“自己影片的成功不在于是一部黑泽明电影的翻版”,这话倒是对的。莱昂内的影片喜欢用脸部特写镜头,注重音响效果,人物的出场都伴随着个性化的主题音乐,这些特点都是从《荒野大镖客》确立的。

黑泽明在《用心棒》之后拍了部续集《椿三十郎》,而莱昂内在《荒野大镖客》之后又推出了两部续集《黄昏双镖客》和《黄金三镖客》。在他的“镖客三部曲”中,我认为《黄金三镖客》是最优秀的,从“抄袭”走向了“超越”,同样也是大师。